

( 2000-2008 )

# 精 华 本

## 新 华 文 摘

新华文摘杂志社编

·  
历史卷



人  
民  
出  
版  
社

(2000-2008)

# 精华本

## 新华文摘

新华文摘杂志社编

历史卷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总 策 划：张耀铭

责任编辑：尹选波

装帧设计：周涛勇

责任校对：高 敏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华文摘精华本:2000年~2008年.历史卷/《新华文摘》

杂志社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01-008335-3

I. 新… II. 新… III. ①文摘-中国②史学-文集

IV. Z89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5337 号

**新华文摘精华本(2000—2008)**

XINHUAWENZHAI JINGHUABEN

历史卷

LISHI JUAN

新华文摘杂志社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中国印刷总公司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9

字数: 409 千字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8335-3 定价: 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 2000 年

- |    |                                         |     |
|----|-----------------------------------------|-----|
| 3  | “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br>——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 李伯重 |
| 21 | 回眸百年敦煌学 再创千年新辉煌                         | 樊锦诗 |



## 2001 年

- |    |                                                      |            |
|----|------------------------------------------------------|------------|
| 31 | 破解千古疑案 填补历史空白<br>《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我国历史纪年<br>向前延伸了 1200 多年 | 彭 林        |
| 38 | 20 世纪的史学成就【两篇】<br>20 世纪中国史学及史学名著<br>20 世纪西方史学及史学名著   | 瞿林东<br>于 沛 |
| 47 | 中国古代的边疆与边疆政策                                         | 马大正        |
| 53 | 清朝逊国 90 年祭                                           | 李治亭        |
| 63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 彭 明        |
| 69 | 苏共亡党十年祭                                              | 黄苇町        |
| 81 | 一代盛世 旷世巨典<br>——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                             | 戴 逸 李文海    |

## 2002年

- |     |                                |     |
|-----|--------------------------------|-----|
| 89  | 人民选择了共产党<br>——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反蒋拥共心态研究 | 刘信君 |
| 102 | 二战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 陈启能 |
| 111 | 我国环境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初探              | 邹逸麟 |
| 121 | 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                      | 张岂之 |

## 2003年

- |     |                                               |             |
|-----|-----------------------------------------------|-------------|
| 129 | 从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看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 陈铁健         |
| 137 | 揭开悬棺之谜                                        | 赵永桂         |
| 141 | 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 葛兆光         |
| 149 | 人地关系研究【两篇】<br>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br>长江三峡人地关系的历史思考 | 高寿仙<br>蓝  勇 |
| 156 | 论中国古代的盛衰巨变                                    | 孙家洲         |
| 163 | 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                              | 江林昌         |

## 2004年

- |     |                                                           |            |
|-----|-----------------------------------------------------------|------------|
| 173 | 苏联 30 年代大清洗研究【两篇】<br>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br>从档案材料看苏联 30 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 | 郑异凡<br>吴恩远 |
| 188 | 论汉代的民族“和亲”并非民族间的政治联姻<br>——释两汉时期民族“和亲”之含义                  | 葛  亮       |
| 196 | 全球化、族群认同与历史教育                                             | 陈剩勇        |
| 203 | 打破分割  促进融合<br>——对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                             | 李文海        |

|     |                  |     |
|-----|------------------|-----|
| 208 | 水利制度史研究【两篇】      |     |
|     | 中国水权制度的历史特点及其启示  | 才惠莲 |
|     | 清代河西走廊的水资源分配制度   | 王培华 |
| 221 | 《三国演义》是怎样塑造刘备形象的 | 张作耀 |
| 236 | 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的变迁   | 王双怀 |

## 2005 年

|     |                       |     |
|-----|-----------------------|-----|
| 249 | 长征中“毛张周”领导体制是怎样形成的    | 余伯流 |
| 254 | 阿房宫考古及反思【两篇】          |     |
|     | 阿房宫:秦代的“半拉子”工程        | 李毓芳 |
|     | 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          | 刘庆柱 |
| 261 | 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 张海鹏 |
| 275 |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            |     |
|     | ——1976:从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 | 程中原 |
| 292 | 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崛起     |     |
|     | ——兼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三次转换     | 汪征鲁 |
| 306 | 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 荣新江 |
| 317 | 遥 制                   |     |
|     | ——蒋介石手令研究             | 张瑞德 |
| 329 | 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         | 步 平 |

## 2006 年

|     |                          |     |
|-----|--------------------------|-----|
| 339 | 民国学界老辈学人的学术传承            | 桑 兵 |
| 345 | “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回顾与改革展望”笔谈【三篇】 |     |
|     | 从习惯线到法定线:我国政区界线性质的变迁     | 侯甬坚 |
|     | 尊重历史 立足现实                | 葛剑雄 |
|     |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行政区划层级与幅员改革之必行  | 李晓杰 |

|     |            |     |
|-----|------------|-----|
| 360 | 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 | 张 涛 |
| 363 | 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  | 芦 荻 |



## 2007年

|     |                       |                 |
|-----|-----------------------|-----------------|
| 371 |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犯的错误 | 张启华             |
| 387 | 中国民族思想的概念及发展脉络        | 崔明德             |
| 399 | 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             | 李学勤             |
| 406 | 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            | 何兆武 讲校 刘 超 笔录整理 |
| 414 | 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再论雅尔塔体系       | 李世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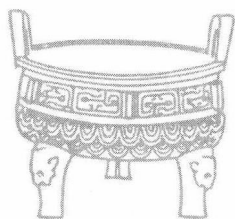
## 2008年

|     |                                        |     |
|-----|----------------------------------------|-----|
| 429 | 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 金冲及 |
| 436 | “她”从哪里来?<br>——现代女性指称的源流考释              | 张宝明 |
| 443 | “20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br>——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 | 王学典 |

# 历史卷

2000 年

“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李伯重  
回眸百年敦煌学 再创千年新辉煌 樊锦诗





# “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李伯重

##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宋代经济革命”的中心

在史家眼中,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41年前,宫崎市定将其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观点总结如下:“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 中国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18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由这段话可见,这位日本汉学大家认为宋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16年后,英国汉学家伊懋可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和“帝制晚期的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而自14世纪以后则出现重大转折,陷入“量的增加,质的停滞”。又过了13年,中国宋史学家漆侠提出了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即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

一个更高的高峰”，“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元代急速下降，明代中叶恢复到宋代水平，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或者说，在金、元时期出现“逆转”，以后则“逐渐地缓慢、停滞下来”）。而到最近，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以迄今为止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做了估算。根据其计算的结果，无论是作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比较，宋代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但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到1952年更下降到537美元。与此相对照，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而1700年达到870美元，超过中国；1820年达1129美元，已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1952年更高达4374美元，为中国的8倍。由此可见，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中和从不同的方面，都得出了“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尔后发展减缓，最后限于停滞”的结论。这个结论已成为现今学坛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主流观点，而此观点的主要基石之一，就是宋代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

“宋代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而依照斯波义信的归纳，则主要包括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他们所说到的各种“革命”，从种类来说都大致相同。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主要内容应当大致也就是这些。宋代中国在这些经济领域中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这是没有争议的。但问题是，这些变化合起来，是否就可以称为“经济革命”？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对“经济革命”作一界定。

从宏观的层面来说，“经济革命”指的是一个社会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一般而言，经济成长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另一种则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在西方学界，有人也将前

者称为“增长”，而将后者称为“发展”。所谓经济革命，通常指的是经济成长方式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的转变。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一定是宋代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增长”转变为“发展”。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其他经济部门不仅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而且还往往依赖于农业或与农业密切相关，所以整个经济成长方式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农业的变化。在此意义上而言，只有出现了农业革命，经济成长方式才可能出现重大改变，因此经济革命也可以说主要就是农业革命。如果没有农业革命，虽然可能也会有一个商业革命（或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等等），但那只是局部的变革，整个经济成长方式并不会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所以并不能真正称为经济革命。宋代的商业、手工业、运输业乃至金融业等都有相当大的发展，但农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伊懋可和斯波义信在对宋代各经济领域的“革命”的归纳中都将“农业革命”置于首位，这是很正确的。其次，在宋代各主要经济区中，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或是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有的分量来说，本文所说的“江南”居于首位，这已是史坛共识，毋庸赘言。伊氏和斯波氏也都明确地指出：他们所归纳的各经济领域的“革命”，并非出现在宋代中国的每一个地方，而是主要发生于中国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虽然其他地区（特别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等地）在宋代经济发展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宋代经济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仍然是江南。如果没有福建、江西、江东、浙东、四川诸地区中任何一个，都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宋代经济革命”之说；相反，如果没有江南，“宋代经济革命”之说定然要破产。

由于农业和江南二者是“宋代经济革命”说赖以建构的主要基石，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确有一个“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这个“革命”应当在宋代江南农业中表现最为明显，因而对宋代江南农业的探讨也就成为研究“宋代经济革命”的核心。如果这个探讨的结论是宋代江南农业没有出现一个“革命”，那么“宋代经济革命”之说也就难以成立了。

##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个“虚像”

如前所述,所谓经济革命,通常是指经济成长方式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的转变。而这两种成长方式的主要差别,又在于技术有无重大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是否大幅提高。因此经济革命也就以技术的重大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为主要特征。在本文中,我们也将以此作为判别是否有“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两个主要标准。其中,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们将采用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农民人均耕地与生产技术未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亩产量的增加来达到的。而我们知道,与唐代相比,宋代江南人口虽有大幅度增长,但耕地增加也很快,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即使不比唐代更高的话,也不会少于唐代。倘若宋代江南亩产量有大幅度的提高,当然也就表明劳动生产率有明显提高。

持“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的学者,大都十分重视技术进步。晚近大泽正昭将以往学界公认的宋代江南农业的进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水利田(圩田、围田等)的大规模开发;(2)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3)生产出大量的税粮和人口增加;(4)出现了以《陈旉农书》为代表的高水平的农业技术。这个总结,与伊懋可和斯波义信所总结出来的情况大体相同,可以说代表了以往学界在此方面的主要看法。由此可见,以往所说的“宋代农业革命”,从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包括耕作技术的改进、新作物品种(特别是占城稻)的引进、一年二作制的普及、水利技术的提高以及农具改良与肥料广泛使用。由于这些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江南,所以引起了“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在亩产量的研究方面,学坛上的普遍看法是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比过去有明显提高,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比较“保守”的估计而言,余也非估计唐代江南亩产1.5石,宋代亩产2石(均为米,下同);吴慧的估计是唐代1石,宋代2

石。斯波义信较早的估计是北宋初1石,南宋后期2石;较后的估计则是北宋1.5—2石,南宋2—3石。闵宗殿的估计属于比较“中间”者:两宋均为2.5石。“激进”的估计则更高,如顾吉辰估计北宋苏州一带水稻亩产4石,“接近于今天的水平”,江南其他地区则在2石上下。而漆侠在其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江浙地区的亩产量,宋仁宗时为二三石,南宋初年为三四石,南宋晚期为五六石;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中,估计两浙路太湖地区的水稻亩产量,北宋时为3石,南宋时为五六石或六七石;而在1987年出版的专著中,则认为江浙地区亩产量,南宋初期为三四石,南宋中后期为五六石,而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达六七石;如与前代和后代相比,则宋代江南亩产量为唐代的2—3倍,与明清相差无几,“虽然不能说它已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但至少可以说是接近这个水平了”。事实上,漆氏最末的一句话显然是太过保留了,因为他关于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数,已超过或达到今天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苏州、上海等江南高产地区丰收年份的水稻最高亩产量。即使按照比漆氏估数低的顾氏估数,北宋苏州的亩产量也不仅大大超过明清江南的平均亩产量,而且超过了1955年和1975年苏州的平均亩产量。

由上述估数来计算宋代江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结果也高得令人惊诧。例如,南宋江南农户户均种田面积若以漆氏所言的30—50亩计,亩产量以五六石与六七石之中数6石计,那么一个农户一年可生产180—300石米。其时江南人均粮食消费量,大约是每人每日1升米,一个5口之家一年食米共18石。换言之,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就可以养活10—16.7个同样规模的家庭(包括该农户在内)。换言之,只要有大约6%—10%的家庭从事农业,就足以养活整个社会。这样的比例,相当于1994—1995年新西兰农业就业人数在社会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9.6%),高于我国台湾省(10.5%)、韩国(12.5%)和俄罗斯(14.9%),更远远超过我国大陆(52.7%)。由此可以推论宋代太湖平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20世纪末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才达到的水平。此外,按照这些估数计算出来的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也非常可观。例如根据漆氏的估数计算,在两宋时期中,江南亩产量增加了116%或120%,南宋时期内增加了86%,而在唐宋时期则增加了

1—2 倍。正是由于宋代亩产量的大幅提高,所以漆氏认为南宋太湖平原的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与此相对照,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 18 世纪(前半期是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形成时期,后半期则已发生农业革命),虽然有一系列重大的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但在此一百年中,该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粮食亩产量仅增加了 10% 略多,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提高了 25%,提高幅度都小于上述漆氏所说的江南亩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技术的重大进步和由亩产量剧增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二者所组成的总体图像,当然是指江南农业在宋代有了突飞猛进,自非“农业革命”莫属。然而,这个为学界广泛接受的总体图像,近来却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批评。用大泽正昭的话来说,所谓“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并非事实,而只是一个“虚像”。

大泽正昭在关于宋代江南农业生产力的专项研究中,对过去学界所说的宋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四个主要方面逐个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1)宋代江南围田(或圩田)的大量兴建,只是湿地开发的初始阶段,所开土地在“干田化”之前,生产能力颇低,而且产量颇不稳定。而江南的“干田化”运动要到了明代才开始;(2)占城稻的种植在宋代江南并未得到普及;(3)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采取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达到;(4)以《陈旉农书》为代表的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并不是当时普遍运用于本文中所说的江南地区的农业技术;即使到了南宋,江南农业中所使用的技术,从总体水平而言,也并未超过唐代后期陆龟蒙所描述的那种技术水平。足立启二、北田英人、游修龄的研究也从不同的方面证实情况确实如此。此外,我本人对唐代至清代中期农业的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也表明:在这一千多年中,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是渐进性的,而且是朝着同一方向的。在此基础之上的农业发展,当然也不会出现戏剧性的突变(即“革命”)和尔后长期性的停滞,因此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来说,“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之说都是难以成立的。

近来对宋代江南亩产量的研究,也证明了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决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么高。例如斯波义信对南宋《常熟县学田籍碑记》中 114 例学田地

租数字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嘉熙以前该县一般亩产量大约在0.65石上下(亩产量以地租量之倍计,下同)。方健对该碑文中的数字进行复核,指出实属该县的学田地租数字应为153例,所涉及的学田共1784.94亩,平均亩产量为0.88石;而据袁甫《教育言氏子孙记》中的田租数字计算,同时期该县上等学田(450亩)的平均亩产量也仅为1.68石。我本人用嘉熙时该县50都的义役田51310亩的地租数字计算,平均亩产量仅为1石;其中产量较高者(438亩),也只是在1.36—1.5石之间。此外,该县有职田32262亩,田租总数364153石。据此推算,平均亩产量更只有2.24斗。学田、职田、义役田在当地应属中等田地,因此南宋该县的一般亩产量在1石以下,应可确定。南宋人程公许说:“姑苏产甲两浙枝邑,常熟复甲姑苏。”可见常熟农业在整个苏州乃至两浙路都名列前茅。若常熟一般亩产量仅为1石以下,那么苏州的一般亩产量决不可能到达2石或2石以上。事实上,淳熙十年平江府官田124203亩,岁收官租21233石;平均亩收租0.17石。据此推算,平江府官田的亩产量仅为0.34石。嘉定县学田1362亩的亩产量也只有0.56石。这里的平江府官田、嘉定县学田、常熟学田与职田亩产量都来自较大面积的国有田地的收租数字,应当比较能够表现当地的一般情况。这些田地上的亩产量都远低于1石,但是从足立启二、大泽正昭、北田英人等人所指出的宋代江南“低田地带”由于生态环境不良而致使农田产量不稳定和使用“易田”农法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低产量也并非不可能。据我的研究,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1石左右。因此,以往对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肯定是大大高于实际情况。

既然“宋代江南农业技术有重大进步和亩产量有大幅提高”之说均不符事实,那么说“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是一个“虚像”,也就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了。当然,江南农业在宋代确实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空间的变化,即农业生产重心从与江南平原毗邻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的“高田地带”向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的转移。这个转移并不意味着“低田地带”的农业技术与亩产量在宋代发生了剧变。相反,这个地带农业的更大发展,是在农业重心的转移已完成之后的明清时代。因此,这种空间变化才是宋代江南农业变化的“实像”。

那么,“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种“虚像”是如何产生的呢?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是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我把持此说的学者所使用的方法作了一个分析,发现这些方法大体可归为两种。在本文中,姑且将第一种方法称为“选精法”,而将第二种方法称为“集粹法”。下面就对这两种方法进行剖析。

### “选精法”:导致“虚像”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在建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亩产量研究中,使用“选精法”颇不少见。有关宋代江南亩产量的记录为数不少,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达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亩产量数字都列出来,总数还多得多)。这些数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一些学者在研究亩产量时,通常是从这些记载中挑选出一两条,以此为据来推导出其结论。例如前引余也非对两宋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顾吉辰对北宋江南亩产量进行估计时,都只列出了一条证据。漆侠估计南宋太湖流域亩产量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据,兹可不论。他又认为南宋江浙亩产五六石,而闵宗殿已明确指出漆氏此说所凭只有一条史料,即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亩产五六石的记录在宋代史籍中仅此一见,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见到的最高产量记录。因此漆氏实际上是选取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唯一例子,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余氏、顾氏等对史料的掌握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漆氏《宋代经济史》中对田租(特别是官田、学田田租)进行分析时所引用的史料来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从这么多的史料中挑选出一条,当然是使用“选精法”了。

“选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义